

■第一视点

□张贵峰

面对蓝藻,我们需要何种“理性”?

针对近日太湖再次发生蓝藻的报道“甚至引起了部分群众不必要的惊慌”。有专家呼吁,“对于太湖蓝藻应理性看待,不必反应过度,更不必炒作”。专家表示:“蓝藻是存活在地球上三十五亿年的生物,并不是污染的特定产物”,“太湖蓝藻已是常态,而非异常状态。这一现象会延续三至五年甚至更长时间,这种状况短时间内无法改变,国际上此类事件多有先例……”(《新华网》4月20日)

对于太湖蓝藻及其背后的水污染,惊慌失措、过分恐慌,当然不是理性做法,也无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因此,呼吁“理性对待”,不无合理性。但是,细品有关专家摆出的上述“太湖蓝藻已是常态,而非异常状态”、“国际上此类事件多有先例”、“蓝藻并不是污染的特定产物”等等相关“理性”论据,以及“不必炒作”的批评,又不能不让人产生一个显得不那么容易释然消受的疑惑——如此“理性”说辞、辩护,是不是“理性”得有些过头了,乃至涉嫌“麻木不仁”、“文过饰非”?进而不禁要问:这就是面对太湖蓝藻,我们所应秉持的理性?

蓝藻固然“并不是污染的特定产物”,却是严重污染不争的生动表征、具体见证;太湖蓝藻虽然“已是常态”,但只是近些年人为污染之下的“常态”,而非其历史上本来固有的“太湖美,美就在太湖水”的“常态”;“短时间无法改变”、“国际上多有先例”等诚然是实情,但这显然又不能成为我们不紧迫解决蓝藻问题的借口、托辞,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更大的实情是:蓝藻所表征的水污染,已到了不彻底解决治理而不可的地步,作为前车之鉴的“先污染再治理”式非科学发展观,在严峻的环境形势面前,更是亟待根本扭转。

这些事实表明,对于太湖蓝藻,目前我们更应秉持,也更急需的其实是这样一些理性:全面直面客观现实地正视理性——既不惊慌失措、过度反应,更不心安理得、忌疾讳医;不满足于现状,对未来时刻保持危机紧迫感的忧患理性——在蓝藻治理上,近年来已取得的成绩当然需要充分肯定,但却不能耽于这些成绩乃至沾沾自喜,更要看到与既有成绩相比的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进一步治理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

据最近环境保护部督查中心对太湖流域苏锡常三城市所做的抽查显示,三市53家企业和污水处理厂中,80%的单位存在超标排污或其他环境违法行为,“暴露的问题十分严重”。为此,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警告:“太湖治理的成果还十分脆弱,管理稍有放松就可能反弹”,并作出“蓝藻水华今年可能再度暴发”的判断。

哲人尝言:“最大的理性是能够反思反省的理性”。具体到环境保护,这种最大理性显然只能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形势稍有好转,犹须就慎”(温家宝语)的理性,而非那种避重就轻、自以为是乃至“麻木不仁”的貌似“理性”。

■文化镜象

□郭之纯

重塑“大学之大” 须破“名教崇拜”

1928年,胡适先生发表过一篇题为《名教》的辣文,批评国人崇拜名词概念、标语口号、符咒偶像的“名教崇拜”现象,疾呼“名教扫地,中国有望”。现在看来,胡适先生的妙文并未过时,因为虽然近百年过去,但他所批评过的现象不仅未能消失,甚或愈演愈烈——时下许多国人,不仅仍然信奉概念口号偶像等具有魔力,还重新予以包装,以全新的面目推出,从而更具蛊惑性。

最新的例子来自“孔子像”的争议。北京大学即将迎来110周年校庆。应该说,对北大这不仅是一个欢快的时刻,更是一个沉重的时刻。联系到该校近年来受到的太多批评,如此时刻,北大乃至全社会更需要的是回顾和反省——反省如何尽快恢复曾经的传统,重塑大学精神和学术文化的尊严。从当前看,反省确实正在进行,但万万没想到如此沉重的反省,竟然是由一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即“是否应该在校内立孔子像”所引起。

真正的大学灵魂来自于活生生的人,大学形象决定于师生的学术水平和精神风貌,而绝对与泥胎的等级和数量无关。显然,哪怕一个大学校园内有一万尊名人塑像,那或许可以成为一个高质量的旅游区,却将与“大学”二字越走越远。

然而,偏偏有人——还不是一般的人,是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将孔子像上升到了“北大灵魂”的高度,强调“竖立中华民族暨我北京大学之至圣先师孔子像,正是继往开来的一大盛举。何乐而不为也?北京大学既可以推动新文化运动,又可以引领我中华文艺复兴的潮流,此所谓大学之为大者也!”

事实上,笔者与很多人的态度一样,并不反对北大在校园内竖孔子像。但孔子像于北大,只应该



漫画 纪宾

■“浙江领导干部民生观察”系列评论之①

□王学进

从“视察”到“观察” 意义不寻常

目前,浙江省委组织部组织的“树新形象,创新业绩”主题实践活动正在扎实有效地开展着,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即省直机关领导全部下基层、蹲点调研活动开展得更是有声有色。《青年时报》连续推出的系列报道《浙江领导干部民生观察》,生动地介绍了几位厅长的调研心得,在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乡野之风的同时,还让人感受到了一种久违了的朴素的干部作风正在回归。

可能是阅读麻痹所致,人们已经不大注意领导视察与领导观察有什么差别,总以为领导下乡调研就如同古时大官出行,要么官轿未动,仪仗先行,鸣锣开道,前呼后拥,要么神秘兮兮,肃静回避,戒备森严,反正都是呼啸而来,蜂拥而去,威风八面,摆足官谱。现如今,虽然小车代替了官轿,西装代替了官袍,但大小官员摆谱的心态依然,迎来送往的仪仗相仿,当然,实际效果也差不到哪里去,走马观花,蜻蜓点水,除了在对下属颐指气使中要足了官派外,对实际民情和民生并没有了解掌握多少,自然也更谈不上怎样认真去解决民生问题了。

民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领导干部要了解掌握民生,从而去解决民生,就得从改变调查研究的方式渠道出发,老老实实地放下官架子,视自己为普通百姓一员,下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交心,也就是说,变高高在上的视察为心贴心的观察,如此,方能真实摸到“三农”问题的病灶、脉搏,探听到当今农民的所思所想。正如省卫生厅厅长杨敬所说:“我想,既然下去蹲点调研了,就要全身心投

入,不然,群众就不可能跟你掏心窝,对你讲真心话。”杨敬说,蹲点中,他从群众那里取到了真经。省林业厅厅长楼国华通过蹲点,了解到群众的心声后,将之概括为四点:“群众最关心的是什么?明年怎么生活,后年怎么发展。最想干什么?修路。最需要什么?技术。最缺的是什么?文化。”什么是民生?这就是。这些民情可不是靠通常的视察所能获悉的。

从视察民生到观察民生,表征着领导调研民生的视角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标志着领导由俯视到平视的转变,群众则由仰视到平视的转变,实现了这一转变便有可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领导也才能俯下身来倾听百姓的意见建议,百姓也才肯敞开心扉向领导表达自己真实的愿望。惟其如此,领导同志也才能够在感同身受中,亲身体会到百姓的艰难以及他们要过好日子的强烈愿望。省交通厅厅长郭剑彪调研回来后在自己的博客上披露了一个很感人的细节:4月1日,他登上了海拔500多米的高峰村,来到80岁高龄的韩根生老人家里,其老伴颤巍巍地拿出一大盆高山红薯。当地村干部对郭剑彪说,这是老人家拿来招待贵宾的,也是他家能拿出的最好的礼物了。郭剑彪很感慨:“那红薯,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红薯。”就是这样一盆普通的红薯,让他记住了村民对交通的迫切需要。因而他回来后,立即着手解决这些村的交通问题,一点不拖延。

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在完成视察民生到观察民生的转变中,改善了干群关系,拓宽了调研渠道,创新了调研方式,大大遏制了领导视察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风气,恢复了当年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只要始终保持这样一种调研方式,做领导的始终能保持这样一种低姿态去倾听群众的呼声,那么,浙江省正在全力推进的解决民生工程一定能取得实效。

恶搞,有些固然是真的为了哗众取宠,也有一些持论有据,并不应该一味遭受批评。

然而,正因为此种心理的顽固存在,在许多人眼里,孔子不再是历史上那个奔波半生同时也失意半生的理想主义文人,李清照也不再是历史上那个多才复多情、与现代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女词人——他和她都成了一种神圣的象征、一种文化的符号,一个被顶礼膜拜的对象。所以,孔子被形容为“丧家狗”是不能被接受的,哪怕孔子自己也曾这样自嘲;李清照被指好赌、滥饮和好色也是不能被容忍的,哪怕她自己的词中酒味十足并且充满令人遐想的暧昧。

重塑“大学之大”,或亟须破除某些“名教崇拜”。

■即时观察

□辛京

加分: 损害公平 异化风尚

2008年深圳中考录取优惠措施近日出台,其中有一条规定:“对于深圳金融界高层的子女,加10分投档录取。”有人感叹,这真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啊!”要知道,加10分就超过了多少名考生?不少家长质疑这条规定是否合法。《南方都市报》4月19日)

更荒唐的是,这一并非“国家机密”的规定,已经实行多年,而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教育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显然,对那些在相同环境下竞争的孩子来说,深圳出台的这种加分政策,构成了对其他考生的平等权利的侵犯,给金融高管子女加分,无疑是政府赋予特定人群以“超国民待遇”。

不可否认,有些政府部门口头上承诺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但在具体操作上,却不时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精神分裂”。按照深圳市政府部门的加分逻辑,这一政策同样可以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必须承认,即使是生活于底层社会的清洁工人,也是深圳需要的“人才”,如果没有他们,这个城市恐怕不出几天便会臭气熏天。然而,为什么不见政府出台一个“惠民政策”,为清洁工的子女加分?如此厚此薄彼,只能说明相关政府部门不仅擅权,而且势利。

事实上,长久以来,一些政府部门滥发“超国民待遇”已屡见不鲜。比如,两年前重庆市公安机关出台了十条服务经济发展的措施,明确提出将为128位知名企业人士提供专门保护,通过“保护知名企业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保护企业领导人尤其是知名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福建漳州市教育局给百位纳税大户的“中考子女加20分”的照顾;河南沁阳市政府颁发“沁阳荣誉市民证”,凡是被沁阳市政府“荣誉”过的投资者,在执法部门进行人身、车辆、住宿检查时有豁免权……这些以扩大招商引资、留住所需“人才”或“财人”为名进行“特权赠予”,难免让人为权力与资本之眉来眼去扼腕叹息。

显而易见,这种始于政府部门的“特权赠予”不仅损害社会公平,更会自上而下异化这个社会的伦理风尚与底线公正。对政府部门的随心所欲出台一项政策这一事实,相信许多为现任政府重视的“人物”,也会在心里盘算自己未来可能的遭际。明眼人都知道,政府部门随意施予的逻辑背后,归根结底仍是对法治缺少尊重或者口是心非。对那些正在享受“特权赠予”的人而言,危险更在于,你今天能从政府部门的随意行为中获得某种好处,将来也可能因为另一个随意行为受损。在此意义上,有理由相信,只有持久的公平正义,才有可能真正为一座城市留住人才,并让他们奉献业绩,安心创造。

应该看到,类似政策能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的进步。就在几天前,湖南省正式宣布,取消以往高考录取过程中形成的“高校教职工子女可录取加分”规定,浙江省也宣布今年起取消“省级优秀学生”加分政策。这些做法都受到了舆论的肯定。在此大势之下,深圳市的这一加分政策,何时才能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于无形?